

海伦路上的大师

在近百年的书法史上，沈尹默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师。其实，何止是百年，谢稚柳就曾称赞沈先生书法为“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”。他的楷书，直攀晋唐，完全可以追配古人。然而，如果你真的以为沈尹默仅仅就是一位书法家，那倒是对先生的误读了。早在上世纪初，沈尹默先生就是北大的著名教授，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六大编辑之一、名噪一时的学者诗人了。然而，晚年居住上海海伦路的沈尹默先生，早已褪尽昔日的辉煌，他不提《新青年》，也不再谈五四，从不提过去的成就，甘于平淡，唯以临池为乐。沈先生以为，书法可以养性，可以宣传，可以用来歌颂新社会。于是他将自己极深的传统书法造诣，化为浅显通俗的语言，著书、讲课，致力于书法的普及教育事业。

我们都知道，沈尹默的双目是深度近视，他读书看报非常吃力，白天要对着太阳光，戴着那 2200 度的眼镜片几乎贴在书本上，方能慢慢地读上一会儿。平时遇有朋友或学生来访，沈尹默也仅仅只看见一个轮廓，分不清面目，只有等来客开口称呼了，他才根据声音辨别是谁。说起来这还闹过一则笑话：六十年代时有一年冬天，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邀宴几位文化人士。沈尹老到达宴会厅时，周总理亲自开门迎候。但沈先生因为看不清，还以为是门口的服务员，于是就将脱下的大衣顺手交给了周恩来，总理也不介意，亲自去衣架上挂好。然后一开口寒暄，沈尹默方知接大衣的竟是总理周恩来，于是连连致歉，深感过意不去。由此可见，沈老的眼力之衰，几近于盲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也能完全凭手上的感觉，将字写得风神萧散、俊逸洒脱。当然，这取决于沈尹默先生博大的书法功力，而更重要的，则是他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，使其书法中飘逸出清雅自然的书卷气，这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。

沈尹默的书法，世人之宝之，皆以能藏得一纸半墨为幸。据说当年在重庆时，沈先生总将自己临写得看不满意的《兰亭序》，揉成团扔在字纸篓里，不料某次却被于右任发现检出，大为赞叹，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。而“文革”期

《管中窥书》是作家、书法家管继平最新出版的又一本新著。这是一本读书随笔，有书话有序跋，又有读书小品等。本书也有不少关于文人书法印章的篇什，在此撷取数则名家的有趣故事，以飨读者。

间，沈尹默尽管已是衰年病体，但依然接受“小将”的多次批斗，还被勒令写“检查”。然而可笑的是，每当沈老的“检查”在海伦路门口贴出时，总会被人悄悄揭走，藏匿家中。

我曾将这故事求证于当年时常在沈老身边的戴自中先生，戴先生说，事情是有是，只是因沈先生眼睛不便，其实好多次“检查”都是由沈师母代笔的。沈师母褚保权先生，身出名门，也是一位书法家，书风与沈老颇为接近，然外人怎能分得清呢？

施蛰存虹口办书店

许多熟悉施蛰存先生的人，都知道施老有则“四扇窗”的典故，妙喻自己一生治学的四个不同领域。其实，施蛰存涉及的领域，还远不止这“四窗”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，施先生毋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文化成就而言，都可谓相当的丰富。他在中学时就发表小说，年轻时还和戴望舒、杜衡这“文坛三剑客”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积极从事地下革命的宣传，为此他们几个还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通缉……

玩文学而不忘革命，这就是当年他们几



个年轻人的梦想。那时，已是共产党人的冯雪峰也和他們关系密切。一次戴望舒、杜衡和施蛰存正在松江老家“避风头”，却接到冯雪峰的北京来信，说他有一个“窑姐”要赎身，想借四百元钱，打算带她一同南下。施、戴得信后很疑惑，没想到冯雪峰竟也有此“浪漫故事”。他们当时身上也没几个钱，但想到不能不救朋友于“火坑”中，于是施蛰存只得四处筹钱，匆忙凑得四百元汇去后，果然没多日冯雪峰来到了上海，但身边并没有带什么“窑姐”。原来是冯要帮助几个被通缉的革命青年离京，不便明说才编了个所谓“窑姐赎身”的故事。

自那以后几年，冯雪峰住在虹口，而施蛰存恰好也在虹口和刘呐鸥、戴望舒办书店，于是，他们走得更近了。

说起施蛰存与虹口的渊源，主要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，他和朋友在虹口先后办了三个书店的故事。那时自日本回来的刘呐鸥，与戴望舒和施蛰存闲来无事，除了游泳、跳舞看电影之外，他们就聊聊文学。一天，刘呐鸥突然提议办一本同人刊物再开一家书店吧。于是一家只有一间店堂的“第一线

7.友好的交往

这首即席所作的长诗，充分表现出龚自珍的诗才，让主人和参加宴席的宾客佩服是毫无疑问的。同时，诗中近乎怒斥的对官僚阶层的批判，大概也让大家惊吓得为龚自珍捏一把汗。在常人看来，在吏部大员的家宴上，岂可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批评时政？

因此，龚自珍的好友魏源出来圆场，认为龚的诗句，有些地方可以做一些修改，诗句可更妥帖。他建议龚自珍把诗中“不使臣一物磨锋芒”，改为“不使朝宁争锋芒”；把“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”，改为“如鱼逐队空趋跄”；把“所惜内少肝与肠”，改为“畴昔报国输肝肠”；把“公其整顿焕精采，勿徒须鬢矜斑苍”，改为“得公整顿焕士气，岂唯须鬢矜斑苍”。这一改，确实锋芒钝减了不少。不知当时龚自珍接受了他的修改意见没有？或许有争执，或许一笑了之。可以确证的是，王鼎并没有因诗中锋芒毕露而不愉快。

从王鼎后来的经历看，此人是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官员。在林则徐因禁烟、抗击英国侵略者而被投降降派诬陷含冤谪戍新疆伊犁时，王鼎为之力谏申辩，但道光帝不纳。他又起草遗书弹劾大学士穆彰阿擅权卖国，自己则自缢身亡，史称尸谏。《清史稿》称此人“清操绝俗，生平不受请托，亦不请托人。卒之日，家无余赀”。以此看，龚自珍在诗中对王鼎的赞誉是符合王鼎的品性的，不是一般的奉承。而王鼎对龚自珍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官僚阶层的激烈批判词句，采取了不以为忤的包容态度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

龚自珍和魏源两人的性格有较分明的区别，一个激烈外露，一个温和持重，但两人却能够相互包容，自从相识后就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。非常难得的是，他们发现了对方的缺点，则毫无遮掩地以诤言相告。龚自珍在信中批评魏源治学，在繁琐的考订中过多消耗了自己的精力，而不善于综观全局，抓住要害，在作诗中也有为文辞而文辞的倾向。龚自珍的批评当然尖刻而有道理，但治

书店”就开张了，一本名为《无轨列车》的期刊也随之出版。结果一个多月后书店被警察以“有宣传赤化嫌疑”而“暂停营业”了。

几个年轻人不甘心，后来又相继开了水沫书店和东华书店。其中当然以水沫书店最为知名，时间也最久。当时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，都到过他们店里来闲谈。如徐霞村、姚蓬子、钱君匋、谢旦如、胡也频、丁玲等等。当然，来得最多的还是冯雪峰。因雪峰的关系，鲁迅也推荐了柔石的一部中篇小说交由水沫书店出版。后来还是由雪峰牵线，欲请鲁迅来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，鲁迅闻之欣然应诺，只是说不宜出面任主编，但亲自策划拟定十二种选题，并承担其中四本书的译事。后因时局变化，“丛书”遭禁而没有出齐（鲁迅译的《文艺与批评》几经曲折还是顺利出版），但水沫书店当时的市面之大，以及和鲁迅先生的愉快合作还是可见一斑的。

现在人们提起施蛰存，总不会忘记他在一九三三年为了“青年必读书”，与鲁迅的一场著名“笔仗”之事。那时施蛰存年轻气盛，意气用事，后被鲁迅斥为“洋场恶少”。其实文人“干仗”的事本也没什么，但实在是因鲁迅的名气太大了，以至于与鲁迅的有关事件都被“放大”，故“洋场恶少”之名也就伴随了施蛰存许多年。不过，施蛰存对此很是淡然，并不以此就和鲁迅“交恶”。其实就在“笔战”前几个月，鲁迅的那篇千古名作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没人敢发，正是施蛰存拿来刊发在自己主编的《现代》杂志上。而在“笔战”后的将近七十年时间中，施蛰存也没有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，相反还多次撰写诗文纪念这位文坛的巨人。

当然，尊敬归尊敬，调侃的话还是要说。施蛰存曾说自己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混迹文场，无所得益，所得者惟鲁迅所赐“洋场恶少”一名，足以“遗臭万年”。故改改杜牧诗句记之曰：十年一觉文坛梦，赢得洋场恶少名。

学与作文，往往与人的性情、天赋密切相关。以魏源的性情，他断写不出《明良论》那样气势如虹的政论来，但他能沉下心来写出一部偏重考订的大著《海国图志》来，也算是抓住了自己才学的本质。

魏源在给龚自珍的信中，非常担心好友因狂狷口不择言而影响前途，乃至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可怕的祸患。他在信中说：“近闻兄酒席谈论，尚有未能择言者，有未能择人者，友促膝之言，与广廷异，密友之争，与酢酢异，苟不择地而施，则于明哲保身之义，深恐有关，不但德性之疵而已。承吾兄教爱，不啻手足，故率而诤之。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，不然，结习非一日可改，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。”这段话真是兄弟之言，出自肺腑。但龚自珍的个性会因此而改变吗，他从此会变得谨言慎行起来吗？从龚自珍一生的行状看，好友的劝告并未使他从此而改弦更张。

这两位近代史上的名人，可视为和而不同的典范。虽然在思想、治学、为人、性情等方面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异，他们的才学有高下，治学兴趣路径有所异，但都未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。他们曾在一起共事多年。

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魏源会试后落第，纳资为内阁中书。其时，龚自珍已任内阁中书多年，他们之间有很多交往和治学上的交流。龚自珍在道光九年（1829）写的《书果勇侯入觐》中说：“源也雅材，龚自珍友之。”而在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魏源因父病回乡省视，随后父病逝。魏源在次年应两江总督陶澍邀请赴南京商议盐务，其间写有诗《客怀八首柬龚定庵舍人》，其中第六首专述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共同的志向：“地平如板舆，天覆如穹庐。与君百年内，托足无斯须。试问所营营，花蕊上蜂须。一春所酝酿，广为三冬储。下备子孙哺，上奉君王需。区区一饱间，竭此百年馥。谁知甘以似，出自苦之余。”其中第三首说：“奇才与庸庸，天地慳其兼。繁艳与硕果，华实无两全。”这是魏源对他们共同命运的嗟叹吗？

金石铁笔仁者寿——高式熊传

潘真



12.干练的企业管理者

当天夜里，洪水如期而至。高式熊与在场的工人果断切了电源，脱了外衣，赤了脚，下到水里抢险，又打电话借来抽水机。工人们虽然嘴上很凶，心地还是蛮善的，这时候都自发赶回厂里，一起把搬得动的东西尽量搬走。大家苦干了一夜，奋力排水，厂里没有一样东西受到损失。从此，工人们彻底服了这位资方代理人。

不久，维纳氏厂承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定做录音机插头的项目，说是“军事任务”，不但技术要求高，还要做好保密工作。5月1日签的合约，10月1日必须交货。他们厂一直是做机械的，北影厂的这个项目却需要浇铸，在铜插脚上镀银。一位工程师被请来抓工艺。有工人提醒说，浇铸有危险，要预先做好防护，出了事老板是要坐牢的。高式熊听取了工人的建议。由于未雨绸缪，从开炉浇铸直到完工，没有一个人受伤。为了按时完成任务，也曾加班加点，但由于大家配合默契，不曾干过通宵……

五个月后，保质保量交了货，打了一个漂亮仗！后来据北影厂的人说，维纳氏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同期法国进口的产品。这些事，都发生在1955年。高式熊就在短短的一年中，成长为干练的企业管理者。

那一年，厂里还分过两次红。高式熊拿到的红利工资都交给了郑老板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拿了一份工资，不该再有额外收入了。

1956年初，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。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“定息制度”，统一规定年息五厘。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，资本家除定息外，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，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1966年9月，定息年限期满，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。

私营的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，就在那一年并入国营上海电影机械厂。14家并入上海电影机械厂的私营厂中，维纳氏厂的条件要算最好的。49人的私营企业，变更登记时，

登记的成分是“小业主”。

公私合营后，郑崇兰挂名私方厂长，做过电影摄影机的他每天上午到厂里转一转。另有两名公方厂长。高式熊则成了厂长文书（有别于厂长秘书），职责主要是经常代表厂长外出开会。没多久，他就被调往幻灯机车间（原名“上海幻灯厂”）去了。在幻灯机车间，他的工种是幻灯片解说词的文字编辑。比起以前干过的活，这个工种算是和他的专业比较对口了——写小楷字、排版、校对，都是他一个人做。

事非经过不觉难，原以为黑底白字再好弄不过了，其实要调好颜色还是蛮难的，字体也需要好好研究。有一次，公安部交办特别任务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某个片子。他照例规矩矩写了小楷，放映后觉得不合适，改成魏碑，字才饱满多了。在不断摸索中，他悟得：幻灯片上的字，不是一般的书法，必须做到片子看起来适宜。有时候，写出来看看已经很好很完美了，但放大了就是不好看，还要动脑筋，反复试验、修改。后来，幻灯片部门与北京幻灯片厂合并，全部搬到北京去了，高式熊没去，暂时到幻灯片发行所做邮购。厂方问他喜欢做什么工作，他想起小时候装过无线电，就想去做录音机组，于是第二天就如愿去录音机组报到，成了一名电讯工。

当时的录音机，用的是与电影胶片一样尺寸的35毫米宽磁片，与之配套的录音，不管是原始录音还是录音棚录音，要求都相当高。拿来试音的音乐，最常用的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与外界听到的声音根本是两个味道。录音师空着手进门，好多喇叭同时试音，他讲得出任何一个声源出了什么问题。

电讯工高式熊每天上班，听的都是最高级的声音，把耳朵听刁了，以至于后来自己家里买录音机要买5万元一套的，OTL、OCL功放必须是自己组装的才能听。

在电影机械厂，高式熊交了一些质朴的好朋友。比如总支书记马悦，知道“电讯工高师傅”会刻图章，有空就跑去和他聊天，有时开会回来就坐在他的工作台前聊很长时间；他也经常在总支书记办公室进进出出，和其他九名总支委员也混熟了，喜欢临摹齐白石的马悦甚至成了他的篆刻学生。

剑魂箫韵

龚自珍传

陈歆耕

